

我国乡村建设实践的价值反思与路径优化*

杨亚妮

提要 由于缺乏广泛的乡村价值认同,我国乡村始终处于一个不断追赶城市的发展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带来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在新的发展语境下,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综合价值的提升,必须先厘清乡村在未来发展中的价值所在,在价值驱动下启发更加广泛和自发、能动的乡土实践。通过中日乡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对比,阐释了乡村价值认知和发展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进规律,以及不同阶段乡村建设实践的侧重点,结合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和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价值视角下的实践路径优化:以价值认同为起点,启发多元化的乡村发展;以价值共识为基础,促进多方主体的协同合作;以价值提升为目标,开展系统性、多样化的在地实践。

关键词 乡村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实践;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4016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4-0112-07

Reflections on Value Judgement and Path Optimization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YANG Yani

Abstract: With its own values being neglected, rural area in China has long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alism and has constantly sought to catch up with cities, leading to a myriad of problems in practice. In the new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omotion of rurality in its own right is emphasized, and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trinsic values of ruralit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o inspire more extensive, spontaneous, and proactive rural practices. Through the reflections 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Japan, the paper explains shared featur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valu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objectiv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summarizes major aspect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Given China's official requirem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 optimized path for rural development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rural valu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rural identity to inspir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build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multi-stakeholder cooperation; and regenerating rural values and prioritizing systematic and diverse local practices.

Keywords: rural values; value-identity; value-consensus; practice; path optimization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2006)。农耕文明时期,质朴的乡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城市根植于乡村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然而在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城市日益成为知识、信息、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高度集中的发展磁极,乡村却被置于人口流失、产业凋敝的尴尬境地,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当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乡村地区不仅迫切需要扭转日渐衰微的发展形势,也面临着如何坚守和延续“乡土中国”的挑战(李迎成,2014)。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此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一系列规划、政策文件的推行,乡村振兴迅速成为各地农业农村工作的统合。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发布,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将进一步展开。

从新型城镇化到乡村振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乡村问题构成了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基础与核心”(张京祥,等,2014)。在过去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发展中,乡村是原始资本和劳动力的“蓄水池”,是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稳定器”(贺雪

作者简介

杨亚妮,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硕士研究生,
19S034083@stu.hit.edu.cn

*作者根据“第五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优秀论文遴选”入选论文改写而成

峰, 2015), 单向地输出发展要素并承接工业和城市转嫁而来的发展成本, 由此积累了许多问题。而在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发展语境下, 乡村体现着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温铁军, 等, 2018), 是延续传统农耕文明和承载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 也将成为新的“发展极”。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推手, 实践中必须明确乡村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探索符合其价值所在的发展道路, 迈向新的“乡土中国”。

1 我国乡村建设中的问题总结: 实践与价值错位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 一般而言, 是指事物对于人的意义(李德顺, 2013)。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乡村价值既是指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社会关系、传统文化等构成要素所固有或衍生的价值, 也指作为主体的人依据自身发展需求所赋予乡村这一客体的价值。

价值和价值关系构成了实践的内在目的和普遍内容——价值使人们明白应该和能够从世界得到什么, 通过怎样的付出而获得, 从而提供了实践的必要性、选择定向和动机、动力(李德顺, 2013)。实践伊始, 主体通过对客体价值基础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客观认识形成价值认知, 并结合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建立起指引实践的价值目标; 经实践改造后, 客体将具有新的价值基础, 而主体的需求也会发生改变, 由此形成了价值认知与实践相互交替、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图1)。因此, 人们对乡村价值的认知直接决定着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目标, 深刻地影响着实践的过程和结果。

建国初, 我国乡村在城乡要素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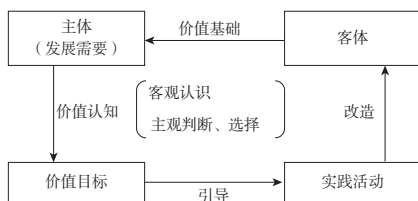


图1 实践过程中的价值认知

Fig.1 The cognition of value in the practice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李德顺(2013)自绘。

中主要为城市服务, 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资本和劳动力。直至改革开放, 仍是以农村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红利支撑城市和工业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深化。自“三农”问题引起重视以来, 国家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 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但无论是以迁村并点和村容整治为主要手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抑或是近几年由乡村旅游带动的新一轮建设发展, 均带有明显的城市化、绅士化的倾向, 实践中存在着空间重构脱离乡村实际、建筑风格任意拼贴、产业发展过分迎合消费文化等问题(孟莹, 等, 2015)。如农民“上楼”所形成的千人村、万人村, 其本质上是城市建设模式向乡村的延伸(焦长权, 等, 2016), 加速了乡村特色的丧失; 再如艺术下乡、设计下乡所造就的美丽乡村,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乡村的独特魅力, 但也存在着过分强调景观审美, 发展模式单一, 忽视村民需求的问题。以上种种, 究其原因, 是缺乏正确的全面的乡村价值认知, 导致实践和发展路径与乡村自身的价值体系错位, 以致于乡村在物质环境上的建设与美化过度, 但内在的发展活力却依然不足。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政策转向, 乡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定位逐渐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文宏, 2019), 新一轮的乡村建设方兴未艾。规划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有必要从价值视角对乡村发展和实践路径进行反思: 与城市相比, 当代乡村的价值究竟如何体现? 怎样的建设方符合乡村自身的价值所在? 如何引导乡建参与主体重新认识和理解乡村价值? 如何实现乡村价值的活化与复兴?

2 在历史中寻找他山之石: 中日对比下的价值反思

2.1 乡村发展中的价值认知演变

乡村凋敝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对的共性问题。西方国家的乡村发展转型肇始于二战后, 总体遵循着“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多功能乡村(multifunctionality)”的演变过程, 所对应的价值认知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变

为消费、休闲, 再到包括环境健康、社会资本等在内的多元的功能与价值(申明锐, 等, 2015)。乡村价值认知的转变过程伴随着国家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相比欧美, 日本与我国文化接近, 传统经济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 其发展历程中对乡村价值的认知也与我国更为相似。以下从价值论的分析视角梳理中日乡村建设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与特点(见图2), 从而更好地理解乡村价值认知对于实践的深刻影响。

纵向对比, 可以发现中日两国乡村发展中对于乡村价值的认知都经历了由农业生产向人居生活、生态保护等多元化的拓展和演变过程, 由其指引的建设实践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对应的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以粮食自给和原始积累为目标的初始阶段, 乡村建设注重农业增产, 基本内容是推进制度改革、土地整理及基础设施建设; 而后是以乡村工业带动的经济水平提升阶段, 同时开始重视人居环境的建设; 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后则开始注重城乡关系的协调, 进而追求更高阶段的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但在横向比较之下, 中日乡村振兴在价值认知和整体的发展进程上均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日本自1970年代即开始注重乡村非农价值挖掘和多元化发展, 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果, 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实践框架。而我国从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后才开始逐渐转变“重城轻乡”的发展思路, 乡村的多种功能与价值也开始得到重视。

如今, 日本乡村振兴已从环境整治和地域再生运动进入到乡土价值观守护与社会意识再构筑的新阶段, 形成了价值驱动下民众自觉、主动组织和参与乡土实践的理想状态。而我国乡村振兴正处于起步阶段, 亟需进一步厘清乡村所特有的价值体系, 建立正确的“乡村发展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具体的、落地的乡村振兴实践。作为乡村振兴的“先驱”, 日本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2.2 面向新阶段的实践路径调整

近年来, 国内针对乡村多功能性和多元化发展的研究逐渐丰富,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乡村的价值内涵与

	农村合作化阶段			经济改革和村镇建设阶段				城乡统筹阶段				乡村振兴阶段					
阶段划分	获取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			解放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支持城镇化和工业化				弥补农村短板,推进城乡统筹				提升乡村发展整体水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目标	中央政府主导,社队为基层组织			中央政府主导,乡政府、村委会为基层组织				地方政府/企业主导,社会组织、村集体共同参与				中央引领,地方、企业、社会组织、村集体共同参与					
实践主体	农业			+ 人居生活				+ 生态				保护					
价值认知	农业生产			+ 人居生活				+ 生态				保护					
中国	1950—1953—1953年 土地改革	1953—1957年 农业合作化运动、农田水利建设	1955—1958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78年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农村经济改革	1983年 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1987年 乡镇企业试点	1994—1995年 村镇建设,全国小城镇试点	2002年 “十六大”提出将统筹城乡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2003年 历史名镇、名村评选,“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2005年 《城乡规划法》颁布,城乡规划为城乡统筹提供法律依据	2008年 《城乡规划法》颁布,城乡规划为城乡统筹提供法律依据	2012年 “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传统村落调查	2013年 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4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	2015年 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2017年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	2018年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日本	1945—1948年 三大改革(农地改革、新农业推广普及)	1953—1955年 昭和町村合并	1955—1967年 第一次新乡村建设	1967—1971年 第二次新乡村建设	1971—1977年 第三次新乡村建设	1977—1980年 “一村一品”为地区规划	1980—1987年 第三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以乡村环境整治为重点	1987—1994年 第四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以乡村环境整治为重点	1994—1998年 第五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以乡村环境整治为重点	1998—2000年 《可持续农业法》颁布,倡导生态农业	2000—2004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04—2008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08—2012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12—2016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16—2017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17—2018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2018—2019年 《景观法》颁布,针对农业、山地、渔业的景观规划
阶段划分	农业生产			+ 人居生活				+ 生态				保护					
发展目标	政府主导,农协成立			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支持				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支持,地方公共团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				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支持,地方公共团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					
实践主体	粮食自给和农民民主化			振兴乡村经济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提高农村地区发展活力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提高农村地区发展活力					
价值认知	生产恢复阶段			农业振兴阶段				城乡交流与乡村魅力重塑阶段				农业多功能与乡村可持续发展阶段					

图2 中日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认知与实践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valu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王伟强等(2010),孙莹等(2017),李思经等(2018)自绘。

乡村振兴的实质。如申明锐、张京祥等提出新时期对乡村价值的理解包括乡村的农业价值、腹地价值、家园价值三个层次,并据此建构了中国“乡村复兴”的非线性转型框架(申明锐,等,2015);章爱先、朱启臻提出乡村特有的价值体系包括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与教化等六个方面,认为乡村振兴是乡村要素再平衡和乡村价值再实现的渐进过程(章爱先,等,2019)。同时,各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实践案例,如从精准扶贫走向全面振兴的十八洞村(尹怡诚,等,2019)、强调赋权和社区参与的陈庄(徐辰,等,2019)等等。新阶段的乡村建设逐渐呈现出与日本相似的实践发展趋势:①实践目标不再局限于经济水平提升和物质环境改善;②实践组织模式由政府、精英主导转向更广泛的民间参与;③实践的形式与内容更多样化。相比之下,乡村价值认知的发展则稍显滞后,尽管学术界不乏对于乡村价值的探讨与全面解读,但未来乡村振兴所需依靠的社会大众对于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需要一个从启蒙、学习到实践强化的过程,从而启发更广泛、自发、能动的乡土实践。

基于上述发展趋势与价值视角下当前实践中仍存在的问题——乡村价值认知囿于城乡对比的框定,参与主体价值取向与目标不相一致,具体实践忽视自身价值基础而倾向于模式推广和经验复

制(图3),以下提出面向新阶段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优化(图4):①树立广泛的乡村价值认同,以乡村自身的特性和发展潜力为起点探寻多元化发展;②在多主体的参与中寻求基于价值共识的实践合作;③充分把握乡村价值的整体性与地域性,通过系统的、多样化的在地实践实现乡村价值的全面提升。

3 多元化发展:以价值认同为起点

3.1 乡村的多元价值与发展可能

在城镇化主导的发展背景下,城市往往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象征,乡村则是过去和传统的代表,如此的城乡二元主义暗示着现代化就是乡村向城市演化的过程(胡晓亮,等,2020),也导向了“向城市看齐”的单向的发展思路。21世纪以来,多功能乡村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快速发展(房艳刚,等,2015),充分论证和说明了农业与乡村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启示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乡村和城市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生活的聚落,如果说“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Wirth L, 1938),那么“乡村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蕴含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逻辑与价值观。

乡村因农业而生,体现了生产过程与自然过程的融合;人们因农业而聚居,体现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因此,乡村价值包括但不仅限于农业生产,

还包括生态与生活。同时,乡村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其价值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时代的延展。以下对乡村价值进行分类列举(表1)

生产、生态、生活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所特有的价值体系,是乡村发展的基石。面向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的生产价值更为多元化。同时,生态和生活方面的价值也能够成为重要的发展资源,融入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之中。多元化的价值导向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因此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见表2)。

3.2 价值认同与乡土价值观重塑

在快速的城镇化推进中,传统的乡村价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破坏,不仅导致了乡村衰败,更固化了人们对于乡村“落后”“低价值”的认知,转而崇尚城市生活。如此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观念下,乡村建设往往带有城市化的倾向,不仅造成了乡村风貌的趋同,也制约着乡村的多元化发展。相较而言,日本城乡发展水平相对均衡,乡村振兴过程中亦十分注重传统乡土价值观的守护,以民众对乡村风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带动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实践活动,通过修复乡村在文化传承、生态环境维护等多方面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乡村价值(王国恩,等,2016)。由此,本文认为乡村价值认同是支持乡村振兴和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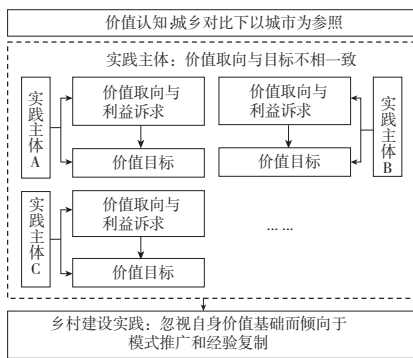


图3 当前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价值认知与实践路径

Fig.3 Value cognition in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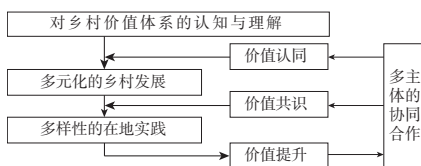


图4 价值视角下的乡村建设实践路径优化

Fig.4 Path optimiz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o realize rural valu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乡村的多元价值

Tab.1 Pluralistic values of rural area	
生产	传统的 提供持续的粮食和农产品供应 (1) 田间生产 (2) 庭院经济
	发展的 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 提供农业升级和一二三产融合的内容与条件
生态	传统的 与自然共生的传统智慧 高度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发展的 农业对二次自然的形成与维持的作用 (1) 保护土地空间, 防止水土流失 (2) 作为次生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消除和减轻环境负荷 (1) 提供景观与绿地 (2) 有机废物分解和污染净化 (3) 气候调节
生活	传统的 维护当地社区和文化 (1) 确保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2)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发展的 缓和都市生活的紧张感 (1) 提供观光、休闲、康养的场所 (2) 农耕体验和自然教育 (3) 作为故乡和家园的精神意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1），申明锐等（2015），章爱光等（2019）自绘。

所谓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对某种或某类价值认可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汪信砚，2009）。乡村价值认同意味着对乡村价值体系和乡土价值观的认可。乡村振兴应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尊重乡村原有的价值体系，根植于乡土而面向未来。价值认同对应的是一个动

表2 多元价值导向的乡村多元化发展

Tab.2 Pluralistic rural development guided by pluralistic values

生产价值	农业的多样化发展 (1) 恢复传统生产技艺的精细农业 (2) 设施农业、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
	六次产业化 (1) 手工作坊式的农产品加工与销售 (2) 乡村旅游 (3) 艺术与文创
生态价值	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与利用 (1) 本土资源的创新运用 (2) 新能源开发
	社区参与的自然环境保护 (1)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 (2) 生态旅游
生活价值	传统人居的活态传承 (1) 古村落整体保护 (2) 乡村博物馆
	社区营造 (1) 宜居建设 (2) 恢复乡村公共生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 仅为笔者根据有限的案例总结整理，并不能代表乡村多元化发展的所有模式。

态过程。首先，人们在认知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某种价值观念或初步的价值判断体系；而后形成完整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规范自我的行为；最后，人们将这种价值观作为追求目标，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杨晓曦，等，2019）。广泛的乡村价值认同应包括以下两点。

(1) 本地村民对地方风土的文化自觉。乡村价值最重要的承载主体是农民（毛安然，2019），应通过组织农民教育和乡村讲堂，帮助农民群体重新认识乡村在地方传统文化、生态资源环境及农特产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重新建立农民的身份认同与职业认同，重拾发展自信，提升村民自主建设家乡的激情与动力。

(2) 城市居民对乡村的正确认知和欣赏。在城乡交流的过程中，市民是主要的消费群体，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尤其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市民对于乡村的审美偏好对其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应通过有效的宣传促进人们对乡村多元价值的充分认知，通过更具乡土特色的体验活动促发对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理解与思考，从而避免乡村陷入消费主义的发展误区。

4 多主体协作：以价值共识为基础

4.1 乡村建设的主体类型与价值取向差异

乡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包括地方政府、

村民、企业、规划师、NPO/NGO 团队等等。多类型主体的参与有利于以不同视角和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发掘乡村价值，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但不同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如村民期望提升收入和改善生活环境，普遍地更关心村庄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资本追求一定的利益回报，热衷于旅游地开发；地方政府需统筹辖区内的整体发展。此外，不同主体在具体实践中的话语权也有所差别，在实际项目中，各类主体间既存在着推进项目实施的共同目标，又存在主导方和配合方的分异和竞争，最终得以落实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的发展主张。

作为乡村本身的组成部分，村民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于乡村价值有着基于当地生活经历的认识和理解。但相较于政府和企业、专业精英等外来主体，村民在资金、专业知识和信息渠道等方面均不具优势。加之当前乡村内部人口流动频繁，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一方面，原子化的农户无法与政府和企业达成平等的沟通对话，使得原本为主人翁的村民反在乡村建设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市场导向下，村民之间缺乏集体意识，实践参与更多的是基于个体获利而非村社整体发展。

4.2 价值共识与合作网络构建

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成一致意见，虽存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差异而能够认可其他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其肯认的价值的合理性（汪信砚，2009）。从价值论的分析角度，价值共识是实践主体间开展合作的前提条件。在传统乡村社会，村民之间不仅是血缘、地缘联系下利益相关的群体，更是共享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孙泉雄，等，2020），依托村社内的自组织，乡村得以实现自治与自主发展。而现行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各方主体间的合作倾向于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导致掌握资本的外来主体过于强势，村民主体性缺失。

在此方面，日本和韩国经过“一村一品”和“新村运动”（李晴，2012），

乡村建设模式完成了由外源到内生的转变。此二者的共性是建立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村为单位来凝聚力量和寻求变化，注重村民自主能力的培育，使之成为主导乡村发展的核心主体；同时，发动广泛的社会参与，地方政府、企业、民间团体等主要发挥支持和援助作用。跟随我国乡村实践的发展趋势，乡村规划的思维应由“寻找动力”向“达成共识”转变。参照日韩的发展经验，实践中有必要搭建一个基于价值共识的合作网络，引领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乡村振兴（图5），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1) 提升村民组织化程度，培养自主实践能力。推动成立合作社、互助组等民间组织，强化公共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汇合个人的利益诉求形成发展共识，以村集体和组织为单位开展对外合作，提升村民主体在乡村建设发展中的话语权。

(2) 设置适当的，约束性的准入原则。企业等外来主体为乡村振兴带来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但必须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尊重村民的发展意愿。合作过程中应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需求确立相应的准入原则，避免外来主体其以单方面的优势在实践中占据绝对主导。

(3) 完善协商机制，促进主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推动实践组织模式由单方主导转向更广泛、平等的协同合作，需建立长效的协商机制，确保各方主体的诉求和意见表达完整，并能够充分理解其他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最终达成共识。

(4) 构建权责统一、各显其能的行动框架。只有清晰界定各主体的权责边界，保证主体间平等的权利和责任的一致，才能够将价值共识转化为普遍的行动规则和规范^[9]，推动实践顺利进行。在合作与协商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各主体的需求和能力，共同探讨实践活动的可行性和分工细节，以及未来的收益分配，制定具体的实践方案。

5 多样性实践：以价值提升为目标

5.1 乡村价值的整体性与地域性

“乡村”的概念是通过与城市的对比而形成的，强调其作为农业人口的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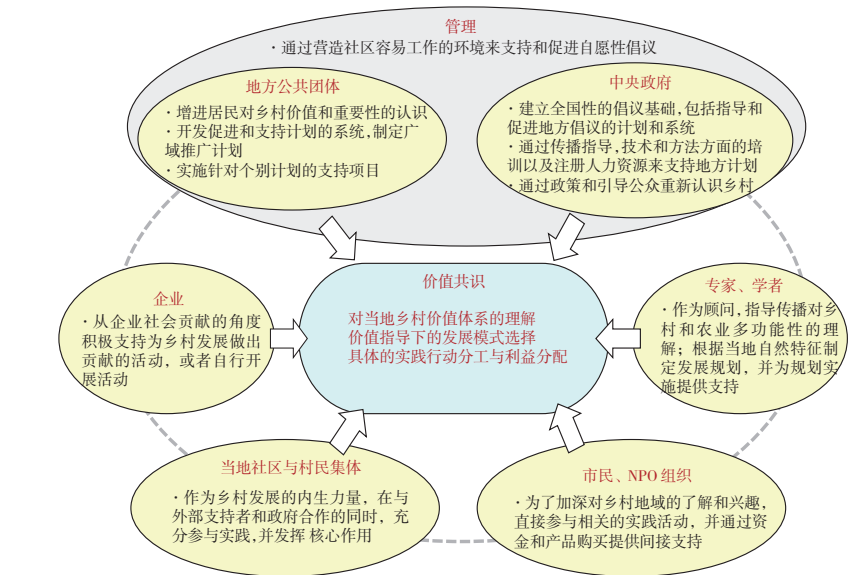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振兴中多方参与的合作网络
Fig.5 Cooperative net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地，因而早期的乡村建设大多以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人居环境为实践目标，较少考虑其他方面。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非农化进程加快，职能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样化发展，其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胡晓亮，等，2020），成为涵盖村庄聚落和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原生自然环境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乡村表现为一种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二次自然”，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长久互动中，乡村衍生出了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因此，乡村是社会-生态复合的复杂地域系统，乡村的多元价值镶嵌于其中，亦具有相互关联的系统性特征，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乡村价值既包括生态、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整体性价值，也包括单项的资源要素的价值，如山林、水系、物种资源、民族文化、风俗节庆、农耕技艺，以及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公序良德等，均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在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下，乡村地域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衍生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因此，乡村价值及其具体表现也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5.2 在地实践与全面振兴

从本质上讲，实践是一种价值创造

活动，成功的实践能够使其对象更好地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即具有更大的价值（郝立忠，1996）。由此，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价值的提升。基于乡村价值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考虑，单一的物质环境建设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代乡村的发展需求。乡村振兴应着眼于生态、社会、产业、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整合，建立系统性、多层次的实践目标，将自然环境和村落的空间形态，以及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村社自组织等均纳入可利用的资源范畴和实践对象。我国幅员辽阔，乡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迥异，文化多元，并且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一，乡村建设中更应注重因地制宜，经由踏实、深入的在地实践实现地域乡村价值的整体提升。具体而言，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 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活化乡村构成要素的价值。针对地方发展开展全面的资源调查与价值评估，根据不同类型资源的价值特点，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探索适于当地的、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表3）。

(2) 统筹全局，平衡和协调乡村价值的各个方面。实践或许从某一切入点出发，但必须认识到乡村的多元价值之间存在的联系，逐渐拓展实践内容，追求“以点带面”而非“此消彼长”，实现

表3 乡村振兴中针对各类乡村资源要素的实践途径

Tab.3 Practices targeting various rural resource element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Japan

	实践目标	实践途径	代表性事例
农林业资源	提升农林业生产附加值	社区支持农业、社区食品系统、复合农林业、庭院林业、生态农民认证、本土品牌开发等	日本北庄：将利用传统耕种技术的梯田米品牌化
	推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居住区林业、资源管理型渔业、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材料开发与利用等	浙江安吉：立足竹林资源，大力扶植竹产业发展；竹材料在新建筑的应用
生态资源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调查、共生农业、环境友好型农林业、保护支持基金与项目等	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农业
	环境教育	中小學生生物调查日、儿童农业、体验研习等	日本鸟取县：动植物保护和生态旅游
景观资源	保护良好的村落景观	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的建造技艺传承等	贵州屯堡：公众参与的传统建筑修缮与遗产保护
文化资源	传承传统文化和生活智慧	手工艺市集、传统技术评估与推广、民俗旅游等	广西金秀：瑶医、瑶绣等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云南霞给村：藏族家庭旅游接待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全面振兴。

综上，乡村建设实践的具体内容具有在地性、系统性和多样性。随着对乡村价值认知的拓展，乡土实践将逐渐由“建设”和“开发”转变为“营建”，而至“经营”——将乡村和地方风土视为“传世资源”，实践的目的在于使其重现价值与活力，并传续下去。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持续的实践。而实践同时也是价值再认知的过程，新的认知推动新的实践，不断地结合时代精神对乡村价值加以新的诠释，展现乡村的独特魅力。

6 结语

作为社会—生态复合的地域系统，乡村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乡村振兴不是对城市的“线性追赶”（申明锐，等，2015），而是乡村系统功能重组和综合价值再实现的过程。日本等东亚国家与我国有着相似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基础，乡村振兴起步早，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价值认知的指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方面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示。

乡村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广泛的价值认同构成了支持乡村振兴的社会心理基础。乡村的未来发展是多元化的，但应根植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体系，充分认识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身份和价值，从而突破追赶式的发展思维。其次，应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广泛的合作网络和多方协作的行动框架，合力推动乡村发展。此外，乡村建设是以整体的乡村地域系统为对象的

综合性实践，应纳入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实践内容，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在地实践，实现乡村综合价值的提升。最后，实践也是再认知的过程，主体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于乡村价值的认识，从而启发新的实践。引导社会各界重新认识乡土，积极参与乡土实践，使价值认知与实践的过程在参与主体身上实现统一，是未来乡村振兴需要努力的方向。

感谢董慰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指导。

注释

- ① 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起始于1970年代末，由地方自发性产生的，政府鼓励村民寻找大家所关心的共同事务、公共设施、产业与文化建设的议题，提出建设的实施方案，居民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培训活动，并参与施工建设。因此运动开展的过程塑造与发掘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村民也自然具备了从共同利益出发经营乡村产业与维护公共设施的愿望与能力。
- ② 韩国的“新村运动”同样是起始于1970年代的，全民参与的地区性社会运动，在政府的引导下以村庄为最基础的执行单元，由新村领导人指导村民协力参与，从最简单的环境改善事业（需要的物质支援较少，大多是村民的劳动力贡献）开始实施，使村民通过基础的村庄建设事业找回建设家乡的自信，推动了新村事业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房艳刚，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模式[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FANG Yangang, LIU Jisheng.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multifunction theory: beyond modernization paradigm[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257-270.)

- [2] 郝立忠. 价值: 实践评价的唯一尺度[J]. 东岳论丛, 1996(4): 51-54. (HAO Lizhong. Value: the only yardstick of practice evaluation[J]. Dongyue Tribune, 1996(4): 51-54.)
- [3] 贺雪峰. 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J]? 社会科学, 2015(6): 64-77. (HE Xuefeng. Problem of agriculture or problem of peasant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5(6): 64-77.)
- [4]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乡村概念再认知[J]. 地理学报, 2020, 75(2): 398-409.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On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2): 398-409.)
- [5] 焦长权, 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 100-116+205-206. (JIAO Changquan, ZHOU Feizhou.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6(1): 100-116+205-206.)
- [6] 李德顺. 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LI Deshun. Axiology —— a study of subjectivit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7] 李晴. 东亚韩国、日本“新村”建设的特色与启示[J]. 上海城市规划, 2012(1): 89-94. (LI Q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Asia of Korea and Japan.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2(1): 89-94.)
- [8] 李思经, 牛坤玉, 钟钰.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演变与借鉴[J]. 世界农业, 2018(11): 83-87. (LI Sijing, NIU Kunyu, ZHONG Yu. The evolution and reference of Japa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system[J]. World Agriculture, 2018(11): 83-87.)
- [9] 李迎成. 后乡土中国: 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4): 46-51. (LI Yingcheng. Post rural China: a review of the pligh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urban a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4): 46-51.)
- [10] 毛安然. 赋权与认同: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4(2): 60-69. (MAO Anran. Empowerment and identity: the path of rural values activating farmer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34(2): 60-69.)
- [11] 孟莹, 戴慎志, 文晓斐. 当前我国乡村规划

- 实践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 规划师, 2015, 31(2): 143-147. (MENG Ying, DAI Shen-zhi, WEN Xiaofei.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rural planning[J]. Planners, 2015, 31(2): 143-147.)
- [12] 日本农林水产省. 農業・農村の多面的機能[EB/OL]. 2001-11. https://www.maff.go.jp/j/nousin/noukan/nougyo_kinou/pdf/bunrui.pd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B/OL]. 2001-11.)
- [13] 申明锐, 沈建法, 张京祥, 等. 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 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J]. 人文地理, 2015, 30(6): 53-59. (SHEN Mingrui, SHEN Jianfa, ZHANG Jingxiang, et al. Re-understanding rural China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perception, value and renaissance of the countryside[J]. Human Geography, 2015, 30(6): 53-59.)
- [14] 申明锐, 张京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 城市规划, 2015, 39(1): 30-34+63. (SHEN Mingrui, ZHANG Jingxiang.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ival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1): 30-34+63.)
- [15] 孙焱雄, 仝志辉.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1): 17-28. (SUN Xiaoxiong, TONG Zhihui. The declin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villagers' discussion on rural matters of common interest" in Xiangshan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China Rural Survey, 2020(1): 17-28.)
- [16] 孙莹, 张尚武.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4): 74-80. (SUN Ying, ZHANG Shangwu. A review of rural planning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4): 74-80.)
- [17] 王国恩, 杨康, 毛志强. 展现乡村价值的社区营造——日本魅力乡村建设的经验[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 13-18. (WANG Guo'en, YANG Kang, MAO Zhiqiang. Community building show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ountry: Japan's charming country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1): 13-18.)
- [18] 王伟强, 丁国胜. 中国乡村建设实验演变及其特征考察[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2): 79-85. (WANG Weiqiang, DING Guosheng. A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features of rural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in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2): 79-85.)
- [19] 汪信观. 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辨析[J]. 学术研究, 2009(11): 5-10+159+2. (WANG Xinyan. Distinction of three concepts: universal value,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common cognition of value [J]. Academic Research, 2009(11): 5-10+159+2.)
- [20] 文宏. 建国以来乡村振兴路程回顾及未来展望——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1): 41-49. (WEN Ho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 R. C. ——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documents[J].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35(1): 41-49.)
- [21] 温铁军, 邱建生, 车海生. 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J]. 理论探讨, 2018(5): 5-10. (WEN Tiejun, QIU Jiansheng, CHE Haisheng. The development of "issue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18(5): 5-10.)
- [22]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24.
- [23] 徐辰, 杨瑾, 陈雯.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以陈庄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 605-618. (XU Chen, YANG Jin, CHEN W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lanning and its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Chenzhuang villag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605-618.)
- [24] 杨希. 日本乡村振兴中价值观层面的突破: 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5): 115-120. (YANG Xi. The exploration of valu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Japan: a case study of Noto's Satoyama and Satoumi[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 31(5): 115-120.)
- [25] 杨晓曦, 张克克. 价值认同视角下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7(6): 109-116. (YANG Xiaoxi, ZHANG Keke. A tentative study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function of homesicknes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 value-identit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37(6): 109-116.)
- [26] 尹怡诚, 沈清基, 王亚琴, 等.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研究与实践[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 (2): 99-108. (YI Yicheng, SHEN Qingji, WANG Yaqin, et al. Fro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rural precise planning in the Eighteen-Cave villa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 (2): 99-108.)
- [27] 章爱先, 朱启臻. 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思考[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12): 52-59. (ZHANG Aixian, ZHU Qizhen.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rural value [J]. Administration Reform, 2019(12): 52-59.)
- [28]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振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1-7.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naissance: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5): 1-7.)

修回: 2021-07